

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提升策略

岳爱武 张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导致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呈现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特征,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面临引导力被弱化、凝聚力被消解、包容力被降低等诸多障碍。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思想的有效整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理念,培育社会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增强党和人民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能力,创新以主流意识形态立体网络为载体的整合手段。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工作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1-0042-0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体制改革”^[1],经过近40年的砥砺前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就,基本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衍生出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态势。在利益分化格局影响下,社会民众价值观“多元”“多样”“多层”“多变”局面逐渐形成,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带来诸多挑战。“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193}为此,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能力,对进一步提高共产党科学执政水平、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凝聚作用。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利益结构的变化图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一方面,提高了资

源的配置效率,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另一方面,“市场所依存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3]，“反映到观念形态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民众意识相对于主流意识的独立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化”^[4],致使不同阶层间的利益诉求日益凸显出来。

1. 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变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各项利益的代表,从利益确立、利益分配、利益整合等各个过程实现着全面掌控,集体利益也被看作是国家利益的附属品,个人利益诉求自然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在国家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城市利益优先于农村利益,工业利益优先于农业利益的利益分配机制下,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被严重压抑,基本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的个人利益诉求。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与实现,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带来事实上的利益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分化。按照改革开放以来获益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4类群体,即“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企业家、证券大户、经纪人、高

收稿日期:2017-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81827);江苏省教育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究重点项目(2017ZDTXM028)

作者简介:岳爱武(1976—),男,安徽灵璧人,副教授,从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级技术人员等在内的‘特殊获益群体’；包括知识分子、一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在内的‘普通获益群体’；包括市场转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人员在内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包括改革中相对受益较少的绝对贫困人口、下岗工人中的极端贫困者、农民工等在内的‘社会底层群体’”^[5]⁸⁷。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渐次拉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诉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有的社会阶层从自身物质利益出发，时刻关注自我的切身利益，急功近利，巧取豪夺，公然漠视和大胆冲击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精神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主动疏远、离散甚至抛弃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出现了一批庞大的缺乏各种资源而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的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保障机制，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抑或剥夺，这部分人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很少关注、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行为准则难以起到规范协调作用，影响着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的落实。

2. 利益关系呈现复杂化趋向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定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趋向，“其中有旧的利益主体内部的利益关系问题，也有新生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更有旧的利益主体与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6]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利益关系单一，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处理这对利益关系时遵循“以中央利益为主，适当兼顾地方利益”的方针，淡化和模糊了地方的利益意识和利益差别。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渐给地方、企业放权，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个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鼓励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不断形成新的利益集体，各利益集体也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单一的利益关系结构被打破，“呈现出纵向权威性利益关系与横向契约关系互相交叉与渗透的趋势。”^[7]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放权意味着地方利益可以实现相对独立化，整体看来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仍属于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是，中央允许地方有更大的探索权和自主性，可以在不损害中央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拓宽地方财政来源，对中央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两者的利益关系既“统一”又“冲突”。地方利益的相对独立化同样使得各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样。在利益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积极合作；当利益目标存在矛盾时，

双方就会以竞争的方式争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地方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利益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关系复杂化的重点表现。除此之外，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企业不再受国家的经济计划来完成生产活动，自主性大大加强，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更加强调维护企业的利益。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利益关系状况，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雇佣员工的单向关系。“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既可能是对立和排斥的关系，又可能是依赖与斗争的关系，还可能是交换与利用的关系。”^[4]日益复杂化的利益关系必然导致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最大化，单向解除已有的利益关系而建构新的利益关系。致使中国共产党整合民众意识以形成合作、和谐的价值共识日益艰难，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培育民众的大局意识、维护集体意识的有效性日渐孱弱。

3. 利益差距呈现显著化趋势

改革开放前，社会群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政治身份上，社会结构以政治分层为主，而平均主义下的分配方式使得群体间的经济差距较小，同时国家在城市中不仅制定了严密的工资等级制度，还依据各地物价水平划分工资区，实行分级划片的计划分配。在农村，国家牢牢管控人民公社，全权处理公社内部的各项分配事宜，长期采取“大概工”的方式，这就决定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微小。据统计，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16，意味着居民收入的绝对平均。然而，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分化出新的利益群体，各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诉求不断扩大，“人们在占有资源、生产技术、劳动工具以及在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差异，出现区域、城乡、行业、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8]，并且这种差距愈发显著。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设为收入差距的预警线，超过0.4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一旦基尼系数的值达到0.5甚至超过0.5，那么表示该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以1978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表1)，可以明显看出，从1978年到2016年这30多年里，我们的基尼系数持续上涨，进入2000年以后，基尼系数一直高于0.4的预警线，甚至在2001、2008、2009年份几乎接近0.5的峰值。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利益差别的状态也十分显著。利益差距的显著化呈现，反映在意识形态层面，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引起全社会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质疑与抵触，对主流意识形态中所宣扬和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产生距离感

与疏远感,甚至被抹上“虚假性”“欺骗性”的口号,而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工作以强化民众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度必然大大降低。

表1 1978年至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变化

年度	基尼系数	年度	基尼系数	年度	基尼系数
1978	0.18	1991	0.324	2004	0.473
1979	0.24	1992	0.376	2005	0.485
1980	0.29	1993	0.3592	2006	0.487
1981	0.288	1994	0.436	2007	0.484
1982	0.2494	1995	0.445	2008	0.491
1983	0.2641	1996	0.485	2009	0.49
1984	0.297	1997	0.403	2010	0.481
1985	0.2656	1998	0.403	2011	0.477
1986	0.2968	1999	0.397	2012	0.474
1987	0.3052	2000	0.417	2013	0.473
1988	0.382	2001	0.49	2014	0.469
1989	0.349	2002	0.454	2015	0.462
1990	0.343	2003	0.479	2016	0.465

4. 利益结构变迁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制约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形成对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导向,其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是自身意识形态的核心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结构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问题,构成了对中国共产党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民众价值的现实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在利益分化的矛盾冲击下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考验。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阶级统治、反映国家整体利益的思想表达范式,整合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首要前提。当前我国民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一方面体现在同向价值诉求上具体内容的繁杂多样,即民众在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条件下,对社会利益分割、利益调控有着更为个性化的诉求,并且这些诉求时刻转变与更新,远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增补进度,甚至有些要求超出了当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范围,无法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加以补充,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当前利益问题的说服力不足。另一方面,多样利益诉求中衍生出异化的价值取向,即部分个体以其自私自利的利益诉求扰乱着市场环境,损害着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表面上呈现出的极大的利益满足感诱导价值根基浅显的群体跟风追随,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根本对立的思想范式。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为个体多元利益诉求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也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诚信”“合作”等基础价值产生着冲击。当前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意味着国家、集体、个体间的从属限制关系有了松动变化,特别是个体与集体、企业间的附属关系有了明显变动,人身依附性大大降低,个体调整自身利益关系

的随意性大大增强,导致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心理作用下部分个体轻易变动合作关系,市场道德水平下降,给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利益个体市场条件下培育“善性”思维造成制约。同时,利益差距的凸显加剧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制约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思路演变至今,却造成了阶层间利益差距不断拉大的马太效应,引发利益群体尤其是底层利益群体对“共产”“共富”价值理念的严重质疑。显然主流意识形态基于利益分化现状做出的理论解答与巨大的现实落差间,民众更倾向于相信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利益问题的束手无措。久而久之,异化的利益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分庭抗礼”,囿于既得利益满足感的民众则默许了异化利益诉求的存在,甚至爆发极端个人主义以求更大程度个人私欲的满足,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价值整合的工作将面临严重危机。

二、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面临的多重障碍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的多样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单一性的意识形态基础。”^[10]利益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利益结构中呈现出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态势,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给中国共产党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思想、意识、价值整合工作带来极大挑战,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内蕴的引导力、凝聚力、包容力及其整合效用的发挥面临多重障碍。

1. 弱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价值导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指明前进的道路与发展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下,占据市场经济发展先机的社会阶层利用自身的优势迅速聚集起大量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聚合成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强势利益主体。导致心理上开始滋生、蔓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甚或利己主义,其价值标准与精神追求逐渐脱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纵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端不符,却也沉浸于丰厚的物质利益带来的满足感和陶醉感,拒绝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化与熏陶。对于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众来说,虽然能够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但是十分有限,因此日常生活中更加关切自身利益需求,“更多地着眼于当前的既得利益,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决定意识信仰的取舍。”^{[5]117}加之当前社会存在利益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利益表达渠道堵塞等问题,“无政府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社会思潮死灰复燃,以“莫须有”的言词与片面的事实解读误导心理失衡的社会群体,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出质疑。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自身的能力缺陷,没有很好地“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内容和体现利益结构优化、市场经济正面价值的思想、观念进行提升、概括,将之充实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11],没能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也就无法正面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利益意识群体的引导作用。

2. 消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社会凝聚功能是执政党在进行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功能,葛兰西将这一作用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水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疏导,达到社会成员的认知、心理趋同,进而把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利益追求协调、凝聚起来,最终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8]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在理论上容纳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取向,在实践上维护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与渠道,同时对思想上的不正之风要不留情面地予以重击。“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10]³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利益获取能力的先天差异性,造成了我国社会大量资源聚集在小部分人手中,大多数利益主体无法获得其所预期的心理阈值,尤其在最大获利阶层间的现实比照中,利益受损感愈发明显,因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取向就会产生偏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之要义,就是要让社会全体成员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正向的、积极的情感取向,以此在全体成员的意识形态中凝铸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共识。而如今的现实是,不能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群体往往偏激地对待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错误地将其全盘否定,“这种情绪化的情感取向一开始通常是个体性的,但个体的情绪极易在群体中传染,特别是个体情绪在群体中产生共鸣时,就会在群体中迅速扩散,进而成为群体共同的情绪。”^[12]利益结构失衡引发的利益意识分化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生存发展根基,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所起的凝聚力。

3. 降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力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力是指通过吸收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科学、合理的价值内容,使主流意识

形态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是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为意识形态注入新鲜血液、保持活力的持续保障。随着利益分化格局的形成,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片面针对当前的利益问题进行“阐释”“解读”和“回应”,以招揽利益受损阶层,壮大其现实影响力,致使其内容与形式愈发难以吸收和管控,消极、错误的意识形态不断滋生以至蔓延,积极、合理的意识形态却以激进的表现形式存在,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提炼。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性吸收的要求为政治目的掩饰,在社会上大肆传播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错误言论,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和指导地位,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基;肆意鼓吹意识形态的自由化,强调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力必须是无差别、无限制的包容,将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歪曲为专制的、垄断的建构;恶意淡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混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原则界限”^[13],妄图抹杀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与利益主张,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力。

三、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的提升路径

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利益意识、价值观念的有效整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在思想建设领域的重要体现。面对利益分化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工作面临的现实障碍,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地把大量的、分散的利益要求凝聚为系统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14],解决因利益分化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凝聚力、包容力,以及科学运用网络技术以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力,进而提升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的有效性。

1.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理念,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关键在于坚定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众所起的引导作用,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将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全民化,把其中蕴涵的利益意识与价值观念灌输到每一个社会民众的思想领域。这势必要求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持久的吸引力和强大的适应力。基于此,“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相统一的规律”^[1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平均化的局面被逐渐

打破,“随着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法化与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人们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呈现多元化,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传播具有了社会基础和传播空间”^[5]¹⁸²,但是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等同于在国民意识中起支配地位、居主导作用的指导思想可以多元化。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是不能被否定或者发生改变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为人民利益的实现而奋斗,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能够体现出“对人类自身发展的现实关怀,即立足现实,满足人民群众合理化的现实需要,关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现实生活。”^[16]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里的“一元主导”不代表可以忽视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牺牲少部分民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意味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应当显示出足够的包容性,做到“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对不违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吸收,寻求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可以兼顾最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共同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民众利益的协调与整合能力。

2. 培育社会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落实好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就要能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活动在各利益群体间形成共同的价值遵循,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协调、整合利益诉求的前提要求出发,做出了两点思考以解决利益分化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消解问题,一是强调“中国梦”以凝心,一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聚力。习近平强调:“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¹⁸中国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的具体利益共同容纳为一体,无论哪个利益群体都能在“中国梦”中得到价值感召,通过向民众描绘“中国梦”的实现图景,展现“中国梦”是对整体利益的维护,促使全国人民“为梦凝心”。培育以“中国梦”为根基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说服力与感染力,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具体的梦想实现成果契合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要求,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期待。同时,习近平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¹⁸⁹如今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利益观错综复杂,千差万别,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核,在认知和理解上容易产生分歧和偏差。要在全社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回答未来社会发展与人民追求的价值取向问题,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准则。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石的价值共识来提升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具体说来就是要在理论上,给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充分的价值肯定;在实践上,首要分析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念,找到共性与个性,探寻思想的交汇点,加强教育引导,营造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只有真正在全社会培养起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才能形成“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和统一意志”^[18],强化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3. 增强党和人民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

注重吸收、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蕴含的积极、合理思想,有利于赋予主流意识形态更加科学、先进的价值特色,以包容促发展,深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的民众认可度。受利益分化的影响,部分非主流意识形态以当前存在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重点对接利益受损群体的思想动态,在其意识形态内容中做出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回应,以期迎合利益受损群体的“价值趣味”。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提炼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内容来扩充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在整合工作中必须强调发挥党和人民的主体性功能,增强辨别与判断的主体意识,避免陷入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陷阱。一方面,社会民众特别是利益受损群体,不能仅凭表面上感受到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打抱不平”,而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进而对其维护与宣传。要意识到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关照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时,更多地是利用这部分群体“发声”抨击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党和人民要深度挖掘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本质,辨识潜藏其中的错误思想,剔除其激进的表达方式,进行理性借鉴;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增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力不是进行无限的包容,西方鼓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包容性应当是“无差别”“多元化”包容的言论,党和人民必须认真剖析、重点批判。这种“无

差别”“多元化”包容的背后,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彻底颠覆,是对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严重损害,民众不能因自身利益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要求有冲突,就认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无差别包容言论以期从中实现自身利益诉求,这样只能导致我国社会整体价值混乱,各方利益诉求冲突,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助推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必须既在原则上坚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有限度的、有针对性的包容,又在实践中具体考察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做到科学借鉴。

4. 创新以主流意识形态立体网络为载体的整合手段,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科学性要求政党在进行各项事业建设过程中富有创新意识,学会运用新思路、新成果、新方法来巩固其执政的基础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亦是如此。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书籍、报纸、学校教育等意识形态宣传方式逐渐式微,网络空间早已成为各类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交流交锋主阵地,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格局,增大了意识形态的管控难度。”^[13]为此,习近平强调:“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197}这既是当前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媒介传播的必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信息化时代存在于发展的必然选择”^{[10]294},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空间的价值引领,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力。中国共产党在创新利用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传播新手段的同时,要形成从理论到制度再到宣传的立体化运用体系,科学使用网络工具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予以反击。在理论上,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核,补充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避免网络空间传播的意识形态脱离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范围,从根基上正本正源。在制度上,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管控,将维护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性工作抓细、抓常、抓严。同时不断完善网络舆论的相关立法,不能让网络空间成为宣传不良言论和错误意识的“法外之地”。在宣传上,党和国家要密切联系群众,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同向发声,让人民自觉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主流意识形态必将辐射在网络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也会在新技术的成熟运用中进一步提升。

总之,“意识形态建设从来就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紧密结合人们现实利益关系来进行。”^[19]意识形态整合工作的着力点应从人的现实利益需求出发,在理论上离不开对现实利益关系的阐释、疏导与整合,在实践上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现实利益需求的满足与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7-02(3).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 [3] 王邦佐. 执政党与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61.
- [4] 刘慧. 利益分化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研究[D].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57-75.
- [5] 吴兆雪, 叶政. 利益分化格局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 [6] 陈锡喜.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和话语权[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48.
- [7] 洪远朋. 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325.
- [8] 宋小红. 新时期利益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及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5): 84-88.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 [10] 黄传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2: 294.
- [11] 徐进. 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之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5: 33.
- [12] 刘云. 转型期利益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J]. 临沂大学学报, 2014(5): 115-119.
- [13] 杜旭宇. 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提升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6(1): 1-5.
- [14] 李建华. 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00.
- [15] 岳爱武, 张曼玉.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4): 31-35.
- [16] 李美玲.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60.
- [17] 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 十八大报告辅助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2.
- [18] 张文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利益整合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5: 142.
- [19] 李英田. 利益关系变迁与意识形态创新[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180.

(责任编辑: 许宇鹏)